



世界处于危机当中，我们需要彻底改变世界体系

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体系，而且必须彻底改变世界体系。然而，它不会自动改变，这需要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必须在各个层面上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才能使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事业将最先发生在全球南方，因为那里的危机状况最为严峻，但要与北方进步人士密切合作。双方可以结成联盟，共同利用当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冲突。

然而，由于系统性危机不断加深，世界体系正经历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有机变化。“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范式受到了生态崩溃、全球财富集中、流行病、金融危机以及持续加剧的贫困和不平等的挑战。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新的多极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主要反映在资本积累向亚洲转移。这将极大地影响“世界主宰力量”与进步力量之间的平衡。我们无法预测有机变化的方向，因为它不受人影响，且很容易导致生态灭绝、大规模迁徙、战争和人类灭绝，抑或导致向进步秩序过渡的长周期。

尽管在地球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建立另一种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我们同样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激进变革，打碎现有体系，从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其中一种方案就是要从局部到全球，逐步实现系统性地去商品化、去全球化和重新共有化(recommoning)。如果人们对替代性世界的意识上升到更高层级，这种方案是可以实现的。另一种方案是通过一系列国家革命，有效地剥夺跨国公司最宝贵的资源即活劳动和自然资源，并通过绿色经济的社会化将资源归还给世界人民。在全球北方，利用周期性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和私人资本对公共救助的依赖，以获得对经济、金融和工业的控制权，可能是通向更美好未来的一个途径，这也将减轻帝国主义对全球南方的压迫。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银行救助、2020 年新冠大流行期间的企业救助以及当前全球竞争所需的国家强力干预，都错失了获得对经济、金融和工业的控制权的机会。

最后，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应坚持要求对奴隶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生态灭绝、新自由主义和许多其他方面的压迫进行集体赔偿。

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在三大洲^①政治趋同的框架内，在法律、经济和政治层面发生的。这一进程应重新定义国际关系的性质，将种族、种姓、性别、土地、农业和生态问题置于国际关系的核心位置。从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循环中“脱钩”是必要的，这一“脱钩”的进程发展到中间阶段时，进步的国家将会加强对主权的需求，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成熟且具有国际主义的目标和雄心。

全球左翼状况及南北方左翼间的相互了解

在世界范围内，左翼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它仍被分裂主义和某些地区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所削弱。尽管如此，左翼仍然集合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和杰出的社会力量。我们应该清楚，前进的道路必须超越分歧，如今，工会、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分歧导致左翼缺乏共同或一致的全球战略。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因地区而异。在全球北方，社会仍享有全球化带

^① 1966 年 1 月，古巴人民主办了三大洲会议，这是一次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会议，此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以及资源开采以促进国际主义的发展。这里的三大洲即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译者注



来的特权，这相应地导致了北方劳工运动的相对失权，而且全球化已将削弱工会的代价向外转移。但北方的左翼组织依然存在，即使他们对斗争的构想停留在微观层面，即使他们对待自由的个人主义不够激进，而且他们有时似乎在客观上无法遏制个人主义。总体而言，北方左翼组织对全球南方左翼和社会运动经验的理解存在偏差，且两者的联系也很薄弱，往往将南方左翼组织视为专制或排斥性的。在全球南方，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买办势力以及各个国家和民众发展经验的失败削弱了这些国家的进步运动。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志之间应该有更多的个人联系与合作。

然而，在三洲空间内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世界秩序的反系统性矛盾，这里也是国际主义阵线可能复兴的地方。三大洲拥有庞大的人民群众，每一次人民对于政治民主化的追求都提供了革命机会，并蕴含着扩张的潜力。在这些起义中，左翼表现出领导力不足且疏于与群众的联系。例如，根据每次起义的经历，左翼往往表现出缺乏自我批判且无能遏制自由主义毒瘤。在南方和北方，左翼都陷入社会纽带和政治团结信任日益瓦解的困境。社群主义、阴谋、暴力和“国家极权主义”威胁的危险也与日俱增。

国家民粹主义的危机，以社会民主为基础的传统福利国家的危机，以及国家主权控制的广泛失败，都反映出全球南方面对新出现的反民主民粹主义者和民族反动仇外势力的无能为力，而这些势力本身对全球左翼就怀有敌意。重建一个强大的全球左翼意味着需要全球人民的参与。群众运动发生在左翼内部或外部。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目睹了新一轮充满活力的斗争和创纪录的全球群众动员。这些运动虽然分散但十分活跃，有些运动致力于为农民和妇女争取权利，有些为移民和反种族主义、反紧缩、社会正义和气候正义而斗争，也为民主自由、公民自由等而努力，但它们往往缺乏对相互关联的问题综合起来进行斗争的能力。而且这些运动也往往局限于街头活动，或者由于缺乏政治组织，或者不能扎根于工作场所，抑或两方都有欠缺。毫无疑问，这些运动大部分情况下还局限于独立的民族国家。他们疲于应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和其他挑战，比如需要应对安全、身份认同和对法西斯分子的挑战。最后，它们通常局限于工人阶级中受过城市教育的“中等收入”阶层，因此也会因未能发掘革命潜在力量而无法实现彻底变革。庞大的全球无产阶级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甚至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无法被满足。

正如新冠疫情期间所证明的那样，所有这些力量本可以联合起来，开展一场全球性抵抗运动，与当代资本主义作斗争。但是，许多参与者和运动都转而拒绝权威，即使是左翼的收入替代和加强公共卫生的议程，似乎也越来越无法起到引导作用。大型制药厂为了攫取巨额利润到处撒谎，以至于这场特殊的大流行病使社会向左转向。

面对这些困难，全球世界各地的左翼都处在骚动之中。但是，要想战胜资本、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父权制、生态灾难、仇视同性恋、仇外心理以及右翼议程的其他特征，就需要一种新左翼的创造力；需要一种对“现代性”和发展概念的替代概念，因为现代性和发展的概念已被抹黑和破坏；还需要创造深层次的融合和新形式的抵抗。民主、平等、生态、女权和反种族主义的进步秩序必须与我们的要求同步建立。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摆脱当前危机的进步之路。左翼仍然希望团结一致地对抗殖民主义。左翼仍在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我们仍然支持最具变革性的形式和行动，以反对单边主义和帝国主义。

我们需要一场运动和一个新型组织



我们的目标是：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建立一个具有完整组织结构的运动组织，并发动一场运动。这个国际组织的出发点必须是三大洲融合，这是联系北方组织的先决条件。它应该遵循反资本主义、社会权利以及包括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和生态原则在内的所有人权原则。它力求超越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分裂。它试图超越近期的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倡议的政治局限性，这些倡议与“世界社会论坛”一样，由于缺乏政治力量的参与且未能为明确的全球需求制定出一个团结一致框架而失败。这一运动应该借鉴国际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现在各种思潮和趋势在社会中出现。在其形成正式组织的过程中，它应该寻求社会运动、工会、政党和其他团体之间的联合。第一国际的优势在于提出了全世界都能理解的普遍性要求，如“十小时/八小时工作制”“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诸如“普选权”的一些民主权利。今天要建立的这个运动和组织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召集全球政党、运动和公民大会的过程。联合的过程需要参与式民主和自下而上的控制，并要给予三大洲的交汇处以特别的关注。

这样一个政治组织的任务是：促进世界的逐步转型。该组织致力于解决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结构以及人类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结束结构性和系统性种族主义，保护环境和人类。此国际组织的起点必须是三大洲的融合，这是联系北方组织（包括现有的左翼跨国机构）的先决条件。

该组织应注重提升其成员之间的多元化辩论、战略研究和网络建设，注重编制信息资料，开展教育工作。该组织应协调跨国运动和团结，在支持抵抗的同时还要构思在社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该组织还可以开展干部培训。

团结进步力量和广大群众

国际/跨国组织支持和整合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斗争。它从全球南方出发，通过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培训教育工作骨干，可以从已有的多种经验中获益。

当前，解决分裂的状况是必要的，但克服分裂不应破坏每个组成部分的独创性和其历史，也不应使该运动脱离大众。这可能就要考虑避免当代左翼的一些问题，如过度重视文化主义（冒着剥夺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环境解放的风险）或专注于身份问题而非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明确是什么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成为进步力量，将这些价值观和政治愿景转化为行动轴心。我们必须尊重每个地区的情况及各大陆的特性，这样做，将有可能找到抵抗的最佳方式。这种表达可以通过协调行动计划来实现，引入民主方法，并始终以民主方式协调行动。此外，行动参与者的职责必须明确。

当今世界，互联网是交换想法和观点的基本工具，它正在取代许多传统组织形式。我们在广泛使用网络时必须谨慎，同时也要注重利用社交网络的潜力。

我们希望实现的主要目标和战略

我们希望通过全球对话，讨论为全球左翼建立一个共同载体的必要性，从而为建立一个革命性的组织做出贡献。我们的名称是“**工人和人民进步国际**”，这是一个工人、无稳定工作者、失业流浪者以及反资本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性别歧视、环保主义和气候正义力量共同认同的组织。我们汇集了包括进步政党、激进民族解放运动、被压迫者社会



运动在内的组织网络，以及坚持最低限度声援各种事业的个人。该组织必须接受战斗性和普遍性的政治运动，倡导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倡导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市场失序”的替代方案。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包含各组织和人民的网络，这些组织包括具有群众基础的进步政党、有激进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劳动人民和原住民的社会运动。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首先，建立一个能够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并能对我们的失败进行多元化批判的国际。我们需要有能力制定与新的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战略对策，以应对全球化的资本危机。这就需要针对左翼的需求开展更广泛的全球对话，并制定一个一致的计划，该计划包括正义、公平、人类发展以及我们所处环境和文化的特殊需求，并能够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的关键问题，如准垄断平台资本基础设施的出现，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社会化、民主化和国际化管理。其次，我们必须提高世界各国民族进步斗争的有效性，为这些力量取得国家权力铺平道路，然后利用所取得的权力进行社会变革、捍卫主权和保障民生。我们可以预见，照此进程，我们将在 21 世纪重新点燃全球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希望，以实现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自我管理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发展为中心的更高形式的人类文明。简而言之，就是要在多样性中实现统一，在公平和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中达成共同议程。

我们的主要战略是：首先，尽快评估那些真正准备好参与反资本主义、反父权制、支持生态可持续发展和国际主义，简而言之，即真正准备好参与革命性计划进程的力量。然后寻找一种民主的方式，以实现这些力量的全面参与，这些力量包括进步人士、运动和组织，尤其是那些有斗争经验和斗争意愿的人士，从而建立一个植根于现实社会斗争的组织。其次，我们需要一个分析、辩论和建立行动阵线的过程，利用一切可行的沟通和见面方式，有效地收集左翼的想法，并组织一次左翼会议，以协调各方观点，详尽阐述关于新范式、全球战略框架和愿景的观念。

我们的手段、资产和制约因素

这一倡议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具有清晰的意识形态，并且具有汇聚力量的能力，这些力量包括一大批持不同观点、拥有不同社会基础和来自不同地区的激进人士、团体和组织。该倡议的集体信念是：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公地”，团结斗争是一种力量也是一次机遇。作为一个网络，该团体应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物质支持，并可以动员群众（农民和所有劳动力量）参与公共行动。从当前背景出发的社会运动，它超越了仅仅是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民主和有计划的新世界的愿景。它一定会“走向新人文主义”，为工人和人民“创造一个新人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这将充分释放个人和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潜能。这场运动必须具有革命性人道主义理念，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主题是解放和反异化（disalienation）。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制约因素对内和对外都很重要。对外，为了争取更多的成员和联盟，三洲倡议应明确传播至各大洲，我们需由大众阶级的思想和具体运动所领导。我们需要得到 20 世纪那些拥有国家权力的运动的支持，我们需要得到反帝国主义国家和政党的支持。我们需要在个人、机构、国家和国际基础上建立一个透明而强大的组建成员和汇集资源的平台。我们需要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以一种直接而果断的方式，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与群众对话，诸如：反宣传、文化、逻辑和激进的说服以及长期教育等。在外部，安全当然是一个重大问



题，我们必须直面镇压，因为有太多活动人士被暗杀，特别是那些捍卫人权和环境权利以及组织工会的活动人士。变革速度之快意味着我们必须制定并及时实现最低目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扭转强大的大众媒体、某些宗教运动、垄断性社交媒体公司以及其他虚假新闻来源对我们天然盟友的洗脑。在社会主义理念被妖魔化的今天，这一切都是重大挑战。

在内部，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物质能力。我们的主要内部协调手段是特设指导委员会，主要机制是虚拟在线互动，这种机制本身缩小了其范围。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支持和鼓励人们通过参与斗争和实践加入这一进程。为此，我们可以鼓励动用部分力量，或采取局部性行动。内部制约因素还包括意识形态混乱和宗派主义、个人化的权力争斗、性别平衡、语言障碍和行政效率低下。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清晰的组织形式和包容性的工作文化，在运动和群众中积极传播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愿景。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国际左翼组织的工作精神。我们还需要确保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并非先决条件，否则就会将组织局限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今后，我们将竭诚欢迎专业的翻译人员、信息技术从业者、信息技术工程师、专业社交媒体传播者等提供技术支持。

可行的结构和决策过程

总之，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调整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自己内部需要对手段、资产和制约因素进行全面评估。然而，物质资源将不得不从最终组成这个国际的各党派和运动中获取，通过按领土、国家、地区和主题举行的面对面和虚拟的会议中获得。选举代表、讨论关键问题和做出组织决策的基础必须是人民，这些人民是该事业的代表和化身，并预示该事业的未来。例如，主要扎根于全球南方的工人阶级领袖、地方和跨国性运动、国家活动人士网络和现有的运动。我们将寻求与具有脱钩实践的左翼政党结盟，即与欧洲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毒瘤作斗争。只要我们可以适度保持独立思考和采取所需行动，我们还可能得到反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

起初，我们将特设一个指导委员会，该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与秘书处讨论各项政策，并一起编制计划。他们根据编制好的计划去执行既定的步骤，并给所有人分配工作，直到我们成功地将该委员会制度化，并为其制定章程和决策规则。

临时国际，包括特设指导委员会，应明确地由公开代表各组织的个人组成，同时还应规定设立一个类似于“顾问委员会”的机构，该机构由来自世界各地可以左右舆论的重要人士组成，这些人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尊重，能够为国际的审议工作增添价值。

一旦我们有了最基本的机构和细则，我们将以民主方式建立一个可撤销且权力分散，并能够横向和纵向运作的分级组织。我们还应当探索一种加权投票制度，以区分 1) 重要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2) 机构（政党和工会、非政府组织—ICO）、社区组织和社会运动，3) 按国家、失业者和无产阶级划分的工人配额，4) 国家代表等不同的投票者。举例来说，这种四分法可以扩展到我们所有的机构和大会，其投票权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划分。

大会将在规定的期限内选举总理事会，该总理事会是执行决定和制定准则的机构，并选举成立一个可撤销的执行委员会。后者可作为执行秘书处，由来自经济、社会、政治、通信、文化和性别、青年等各部门的专员组成。总理事会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开展工作，所有其他决定将以多数票作出。至少，国际主义大会的重大决策是以多数票作出的。



与价值观和目标一致的其他国际组织、政党、运动、工会、团体、个人……建立联系

发布宣言之后，我们可以就 21 世纪的战略问题召开一次全球性会议。所有与会者都应明白，他们正在参与建设一个国际，而不是加入一个现成的 21 世纪国际。如果没有那些受民众欢迎，并在反帝国主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党派和运动的参与，我们就无法获得足够的实质性条件来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制定一份主要联络名单，从中招募人员。这种外联工作必须战略性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对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给予优先评估，因为它们与全球政治经济和全球政治文化相关。我们还应与其他以建立国际为目标的组织举行并行会议，以讨论融合的可能性，同时不被机会主义倾向所吞并。应以同样的方式与个人、政党、运动和工会进行接触。

此外，我们应充分利用熟人之间的直接联系，邀请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参与这一进程，因为这仍然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最有效的手段。我们应为启动进程创建一个网站，并利用该网站提供信息和交流手段。应成立一个外联小组，负责寻找和联系潜在的联盟伙伴。应成立“宣讲团”，带领规划委员会的代表前往各国，与可能的参与者接触。我们应主办线上会议，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主办线下会议来讨论一些人们所期望该国际解决的问题。